



# 太虚大师“佚文”

## 《佛学的将来》考述

文 | 黄夏年

太虚大师(1890-1947)是当代中国佛教的著名僧人、佛教改革家、佛学家,对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巨大。大师一生著作等身,留有《太虚大师全书》约七百余万言,得文一千四百四十八篇,纂为四藏,凡二十编。但“因为编纂工作必须于预定时间内完成,不能更广事搜求,遗漏之处,在所难免;尤其是一般酬应方面的文字:书信、序跋、题赠等,多贮于私人的静室笈笥中,无法征集汇编,遗漏当必更多,这是工作同仁,所引为遗憾的一点。”<sup>①</sup>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太虚大师佚稿〈肇论〉‘四句偈’解”研究》一文,考证了太虚的佚稿《〈肇论〉‘四句偈’解》<sup>②</sup>的情况,分析了为什么这篇文章没有被收入到“全书”里的原因。现将发现的另一篇“全书”目录里没有记录的《佛学的将来》一文之情况,做一简短的分析,以飨读者。

### 一、缘起

重庆社会科学院杨孝容给笔者来信谈到:“在《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中发现一本《佛学的将来》,广州1935年印行,只有18页,现馆藏于广西图书馆。《太虚大师全书》中没有发现,其他民国电子资源(料)中也没发现,有可能是佚稿。”接着杨先生又贴上了他从“全书”检索发现有一篇文章曾提到此书。现将该文引述如下:

答广州某报记者问(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广州六榕寺)

问:法师对中国佛教进程之观感如何?答:中国现在的佛教,在从清季衰落后的复兴过程中,但同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一般,尚无确定之轨道。

问:世界各国佛教近势如何?答:印度虽为佛教之发源地,但七八百年来久无佛教。而中国、高丽、日本为一系;西藏、蒙古为一系;锡兰、缅甸、暹

罗又为一系,此三系近来都有流行欧美各国趋势。

问:佛教哲学与现代科学之关系如何?答:佛教之万有缘生、如幻而无实体之哲理,得现今最进步之科学为证明者极多。故佛学亦可谓科学的宗教。拙著“佛学的将来”曾有论及。

从上可知,太虚接受《佛教日报》记者的采访时,提到了“拙著《佛学的将来》”。

1935年4月10日,《佛教日报》在上海创刊,太虚任社长,范古农任总编辑。最初由邓慧载主事,后改由胡厚甫主持。该报随顺时代、适应形势、宣扬佛化,宗旨为指导世俗人士认识佛教,警策佛门弟子修行,宣传各宗教义,联络佛教团体,促进佛教教育,消融新旧意见,主张万善同归。主要版面有:新闻、社会消息、专件、评论、格言、人范、文苑等,该报能及时地反映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佛教动态。该报不定期推出《中国佛学会上海市分会周刊》,刊出一些佛教理论的文章。从1936年7月起,登载有关中国佛教会问题讨论文章。1937年8月23日,淞沪战争发生,改为4日合刊一张。同年12月28日停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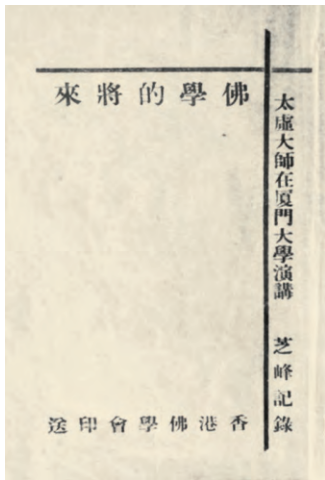
太虚为该报撰写的《发刊题辞》曰:

今欲振兴佛教,予中国国家之前途,以及全人类将来之莫大幸福,当有普通之宣传,揭示佛教真相。一方使佛教徒认识自身,尽住持佛教、护持佛教之责任;一方纠正一般社会人士之误解,未起信者使起正信,于全世界人生途上,开一光明之大道。<sup>[3]</sup>

由上可见,这份报纸是以宣传佛教改革思想为宗旨,以“唤起僧伽之自觉,改革僧制,去滥去愚去俗”“示其佛教信徒所应守之范围”为目的,将佛教的基本知识用与时俱进的观点诠释,把深奥的佛教理论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将各地的佛教情况介绍给群众,所以它是当时最通俗的佛教报纸。

## 二、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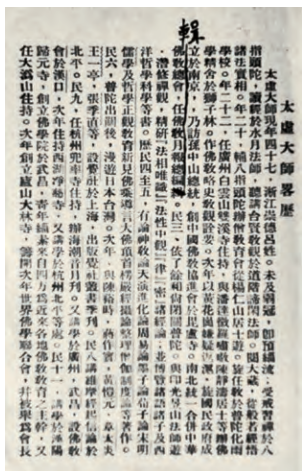
根据杨先生的提示，我们知道太虚大师生前的确写过一篇《佛学的将来》的文章，笔者请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孙国柱帮忙寻找，最终找到了这本著作（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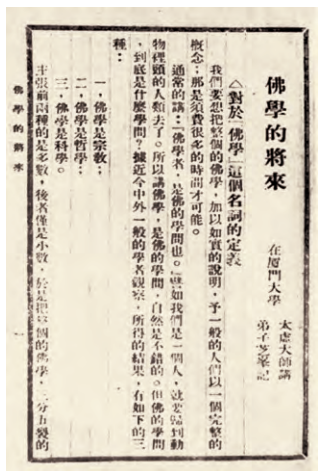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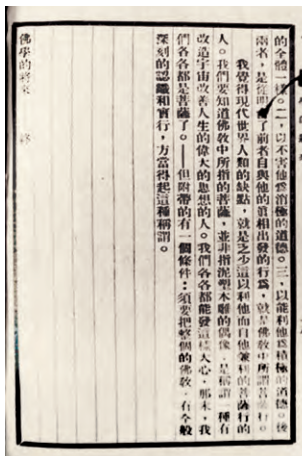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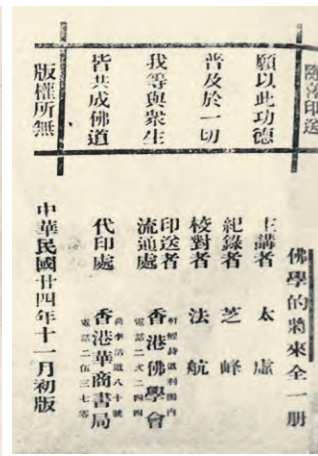
图三



图四



图五



图六

以上六张照片，基本上概括了该书的特点，对读者了解此书有重要的帮助。下面予以分别说明。

图一是此书封面，上面标明书名为“佛学的将

来”。另外特别提示：“太虚大师在厦门大学演讲，芝峰记录”，由“香港佛学会印送”。也就是说此书是在香港出版的。释芝峰（1901-1971），俗名石鸣珂，字象贤，浙江温州人，1949年还俗。曾在中国佛学院执教，于1971年逝世。芝峰著作等身，文笔犀利，主张佛教要进行改革，其文章主要散见于《海潮音》《现代僧伽》《现代佛学》等杂志。他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唯识三十论讲话》《禅学讲话》等书甚受读者欢迎。

图二是“太虚大师法像”，从太虚背后的背景来看，这是在室内拍的照片。照片两边的文字是：“大师之志在整理僧伽制度 大师之行在瑜伽菩萨戒本。”

图三是“太虚大师略历”，简单地介绍了太虚的履历。文中开篇就说“太虚大师现年四十七”。<sup>[4]</sup>“略历”是介绍了太虚47岁以前的事情，接着就介绍了从太虚受戒习禅于八指头陀，到民国二十三年间的经历，最后强调：“中国佛教近日为世界所重视羡慕者，咸归功于大师云。”<sup>[5]</sup>

图四为正文首页，下面专门刊印了“在厦门大学 太虚大师讲 弟子芝峰记”的字样，且文章名就是“佛学的将来”。

图五是正文最后一页，上面标明“佛学的将来 终”，为第18页。

图六是封三，除了记录“主讲者太虚 记录者芝峰”之外，还出现了“校对者法航”。据传敬撰《法航师往生传》云：“法师俗姓王，籍江西。”<sup>[6]</sup>法航法师是一游方僧，此书在编辑以后，他担任了校对。可惜的是，他在此书出版前已经去世。此外，封三还有：印送者流通处是“香港佛学会”，代印处“香港华商书局”。出版日期为“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说明此书（可称为“香港版”）是第一版，印刷时间是1935年11月。

以上几张图版完整地说明这本书是存在的，而且还流通过。

## 三、考述

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系谈佛教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从哲学、科学和道德等不同的方面做了阐述，它不可能被遗忘，但为什么没有收入到“全书”里面，笔者带着这些疑问做了一些分析。

“太虚大师略历”提到“太虚大师现年四十七”，

书中照片是在他 47 岁之前所拍。文中最后强调：

最近，以港粤两地各佛教团体敦请南来弘法，将在各大学及各佛教机关演讲，大师“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戒本”。尤以挽救世运，指导人类和平，建设人间净土，为其无尽之大慈悲行，中国佛教近日为世界所重视羡慕者，咸归功于大师云。<sup>[7]</sup>

上述这些说法，并没有对这本书的缘起做充分说明，只是强调了太虚的历史与重要地位。看来，要想找到出处，还要另辟蹊径。

此书封面提示：“太虚大师在厦门大学演讲，芝峰记录。”在正文的第一页里也提到了“厦门大学”四字，也就是说“厦门大学”四个字才是我们要去考察此书出处的最关键词，笔者查找了印顺法师编纂的《太虚大师年谱》一书，发现太虚与“厦门大学”有关系的是：

民国十五年（1926），大师 38 岁。

（十月）十一日，“大师乘德加大轮船启程回国。与前厦门大学校长黄琬（孟珪）同舟，倾谈颇不寂寞。”<sup>[8]</sup>（《自传》二十；海七、十一“事纪”）<sup>[9]</sup>

二十二日，“大师偕常惺、蕙庭等，赴厦门大学参观，应约为讲‘缘起性空之宇宙观’，常惺记。”<sup>[10]</sup>（《自传》二十）<sup>[11]</sup>

民国十九年（1930），大师 42 岁。

大师应厦门大学之约，往讲“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芝峰记录。大师以为：

人类的文化，是依各宗教为集中点而彼此有歧异，故主以耶、回、佛为三大文化总线索而研究之。欧美澳以耶，亚西及非洲以回，而亚南亚东之文化，则以佛教得以见其总线索。分别研究，再将三大系的文化，熔冶在一炉，使之铸成为全人类瑰玮灿烂的新文化。而近来之哲学，如新实在论之“中立元子”而“论理构成”；唯用论之“纯粹经验”

而“知识雕成”，大师论为渐近佛法之“诸法众缘生”与“诸法唯识现”。<sup>[12]</sup>

民国二十二年（1933），大师 45 岁。

一月十八日，“大师辑‘慈宗要藏’竣，为之叙（文）‘腊’，大师应厦门大学心理学会之约，讲‘梦’，虞德元记。”<sup>[13]</sup>（记者“附

识”）<sup>[1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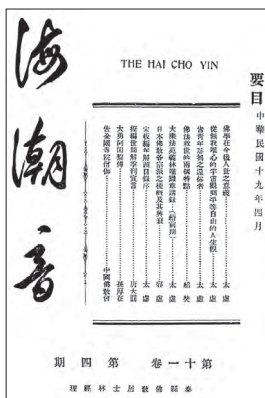
以上是在 1934 年以前，太虚与厦门大学的交集，前后有三次。

从上面的三次记录来看，第一次和第三次都是讲得非常专业的佛教理论与泛谈世界哲学。这与文化的《佛学的将来》沾不上边，笔者通过技术检索，确实没有看到与《佛学的将来》内容相同的文字，故基本可以排除这二次与《佛学的将来》有任何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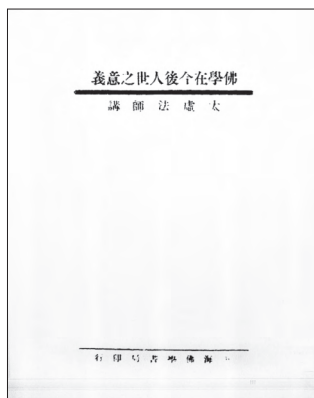
第二次，即民国十九年（1930）太虚在厦门大学的演讲。按《太虚大师年谱》说，这次题目是《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芝峰记录。这里出现的“三大文化总线索”之关键词，就已经非常接近《佛学的将来》的内容了，但是我们还不能确定《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就是《佛学的将来》，只有找到《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这篇文章，并且作出比较之后，才能最后给出答案。

为此笔者检索“全书”目录，发现《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收入在“全书”第十三编里，除了主标题之外，还有副标题“十九年二月在厦门大学讲”。既有“芝峰记录”，又有“在厦门大学讲”，也就是说，至少有二个内容是与单行本的《佛学的将来》是重合的，只要再对照一下内容，就可以确定二者间的关系了。但是“全书”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开始编纂的，《佛学的将来》与《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二者的内容完全相同，也不能说明二者间的关系，它们之间还应有一个“第三者”存在，而且这个“第三者”应该在时间上早于前两者，如此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链。

在《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文尾，有“见海刊十一卷四期”记载。所谓“海刊”，是指《海潮音》，此刊为太虚所办，为中国佛教历史办刊最长的刊物。



图七



图八



图九

《海潮音》前身是《觉社丛书》。《觉社丛书》出版至1919年冬第五期时，读者来函请改为旬刊、月刊的要求纷纷不已。适时大慈法师在杭州购得西湖南山净梵院，潜修于西子湖畔。太虚亦有驻锡一年的打算，于是议改觉社季刊为月刊，定名曰《海潮音》。

1920年元月，《海潮音》乃开始创刊。<sup>[15]</sup>《海潮音》是月刊，一年一卷，“十一卷四期”则是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刊，《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就刊在这一期上。然而随着不断检索，我们发现好几种出版的《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和《佛学的将来》之小册子，现按书名与出版年代的顺序，依次排列如后。

再列举一些图片反映此书在6个不同时间印刷的版本记录。

图七，是最早刊出《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的《海潮音》十一卷四期封面，文章名就放在第一篇。说明此文非常重要，是编者想推出的重点文章，否则不会安排第一篇与读者见面。

图八，是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上海佛学书局于1933年出版的《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的封面。这个封面在几个版本中做得最素雅、干净，凸显了太虚大师的人格风范。

图九，是现藏于河南图书馆的汉口佛教正信会印行的《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的封面。

图十，是现藏于广西自治区图书馆，由广州金龙印务公司于1935年印行的《佛学的将来》。此版的封面很特别，将太虚的文章题目放在最上面，而把前面介绍“太虚和尚宏法略历”的标题放在了正中间，好像这本书是专门讲“太虚略历”的。封面右边是“太虚大师在厦门大学演讲，芝峰记录”，右上角手书有“林校长惠存”。左面则有“广州佛教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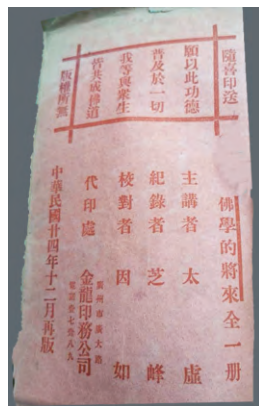
人欢迎太虚大师大会印送”。左上角还有“贵县佛教会汇书”。左下角手书有“梁宪尧敬赠，三七、四、六”。贵县即是现在广西的贵港，系民国时广西四大城市之一。可知此书虽然为广东佛教界所赠，但是这本书却流传到广西了。封面送书者“梁宪尧”疑为贵县人，受书者“林校长”很可能是当地一位学校的校长。据载，当时贵县已有佛教会，因此“汇书”者即为佛教会。在封底还标示了“校对者因如”（图十一）。出版时间为“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再版”，仅比香港版晚一个月的时间。此书所附的“太虚大师法像”（图十二）与香港版的太虚像又不一样，这是太虚穿汉僧装所拍的正面像。这张照片的太虚看上去略比香港照片要年长一些，大概此时因为太虚在外面讲学，人比较疲惫，所以看上去有些老相。虽然此书的封面与书中配的相片有自己的风格，但是封底已经明确说了是“再版”，看来此书应该是香港版的“再版”，但是，在封面与插页设计上则更显自己的风格。

图十三，则是在1945年编纂的《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三编里的《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封面。（为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由此可知，此书至少有过6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发表在民国十九年四月《海潮音》十一卷四期上（见图七）。第二个版本（图八）和第三个版本（图九）仍然用的《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之名。第四个版本（图一）变成了《佛学的将来》，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香港佛学会初版；第五个版本是广东再版的《佛学的将来》（图十）；第六个版本是《太虚大师全书》之《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见图十三），这应是“自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至三十七年五月三十日的编纂，已经功完



图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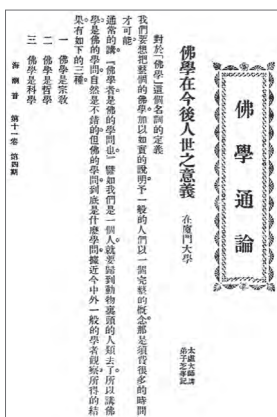
图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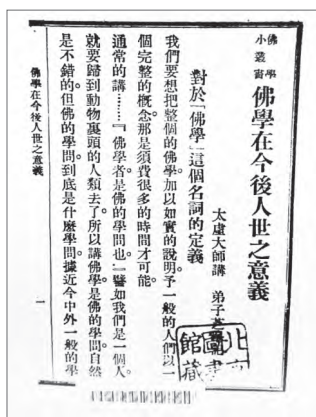
图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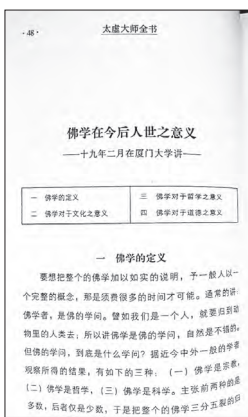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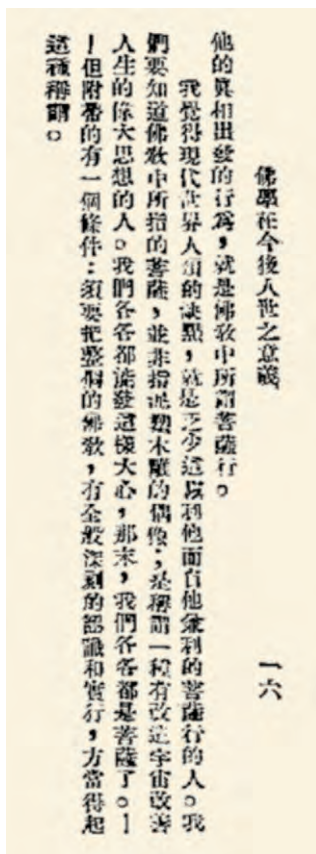
图十六

成了”<sup>[6]</sup>之最后一版。由此，我们基本厘清了这篇文章的发表、印刷顺序，知道了它们不同时期的情况。

出版时间不一样的6个版本实为一个出处，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改动呢？这也是笔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由于它们最终是以《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和《佛学的将来》两个书名出现的，故我们将此最早《海潮音》篇（图十四）与香港版（图四），以及最后的“全书”篇（图十六）之三篇文章，放在一起做了一个互校，最后发现，《佛学的将来》是《海潮音》一文的直接翻印。“全书”本，则是在前二本基础上的校改后的新本，故所谓三篇，实为二篇，最后一篇才是有所改动的新本。

笔者细心地将两篇文章全部进行校对，发现这两篇文章除了名字不一样外，其内容完全一样。但是在“全书”里的这篇，重新做了校对与编辑，并且在段落划分上，也重新做了组合。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不仅两篇文章原为一篇，而且在文字的改动方面也不是很大。从改动来看，除了标点以外，主要是在文字上做了调整。从总体上来说，使原文变得更加精练，并且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例如《佛学的将来》原文的“学哲”被改回“哲学”等等，但是也有不恰当的改动，例如《佛学的将来》原文：“是使学哲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被改成了“重进一步”，当然这只是小疵，不必多议。总之，“全书”里的文字肯定比以前的文字要好多了。



图十七

此外，汉口版的《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显示最后一页是“十六”页（图十七），香港版的《佛学的将来》显示最后一页是“十八”。而佛学书局版的最后一页是“三二”。前两者相差二页的原因，是因为香港版前面有“太虚大师略历”占了位置，并不是正文因为内容增减而造成页码的不同。佛学书局版则是因为开本为小本，页码增多，故最后成为32页。所以，六个版本同一内容的书，一共有五个版本，即《海潮音》版本、上海书局版本、汉口版本、香港（含广州）版本和“全书”版本。

#### 四、结论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6个版本不同时间发表的实则为同一篇文章，而且，又知道6个版本文章有两个不同标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既然太虚自己讲到《佛学的将来》，“全书”里面也收入了太虚的讲话，也就是说太虚本人与编纂“全书”的编者都应该知道有这么一本《佛学的将来》存在，然而这本书却没有被编入，原因是什么？从学术上讲，作为基础资料，编者应该对不能编入的理由要讲清楚，告诉读者《佛学的将来》这本书就是《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的另一个名字，这是对太虚、对读者呈现的负责态度。可惜的是编者没有做这件事，所以才给我们提供了要加以考察的必要。

要说明这个问题，还要从“全书”的编纂说起。据有关资料记载：“全书”的编纂，早在抗战期间（民国三十四年）大师卓锡重庆汉藏教理院的时候。起初，大师拟编印一部太虚‘学要’或‘评传’之类的书，并责成空法师收集材料。因大师讲述甚多，工作是非常繁重而费时的。未几，抗战胜利，举国人民都在新的希望下欢欣鼓舞，佛教整理委员会也在太虚大师领导下，在政府的督促之下，最终成立了，大师回到南京，倡立‘佛教文化社’，以李子宽居士为社长，宗

旨为‘流通经教，编印高僧大德之言论著述，及发行佛教书报杂志为职志’。而主要意旨，则在‘搜集太虚大师所有言论著述，集成一大丛书，正名为太虚菩萨藏……分期出书’（见《太虚大师丛书预约说明》）。至此，大师著述之整理编纂，乃进入新的阶段，并聘请重庆法尊，武昌苇舫、印顺，南京尘空法师为编勘委员，分别各负一部分材料收集整理之责任。大师特约北平杨星森居士来京，负责汇编校印，就地出版发行。工作正待展开，并由佛教文化社发行预约，希望于三十六年春刊行初编。”<sup>[17]</sup>

为此，“全书”编纂委员会找到印顺法师来做主编，因为“印公既曾被大师举为编勘委员之一，居武昌时，曾受大师命将《海潮音》《正信》等所刊文章，勘过一次，并制有目录，及提供一些意见备为参考，故对于全书的内容与数量，了解得很清楚，认为全书约在六、七百万字，而搜集材料，校勘、抄写，乃至编纂成书，非有四至五人集中起来，工作一年不可。”<sup>[18]</sup>农历四月八日，太虚大师荼毗日，大师弟子齐集上海，大家一致公推印顺法师负起领导编纂全书的责任，印顺选择宁波雪窦寺为工作地点，改《太虚大师丛书》为《太虚大师全书》，原拟之《太虚菩萨藏》，仍保留原名。对外征集材料，则改“编勘委员会”为“太虚大师全书编纂委员会”。

太虚示寂时 59 岁，生前没有看到“全书”的出版。“全书”搜集的材料大部分稿件都是借来的，“即如发行二十余年，刊载大师著作最多的《海潮音》月刊，也是向杂志社借用的，而先后出版的单行本，也多无处搜购”。实在不得已时，再请人抄写。每篇稿件，都经过几个程序才能最后定稿，如“不同版本的校对（经论原文，则与清版藏经对校），标点，察填撰著与讲说的时间地址，长篇文章前加写章节项目，批画排印格式，重审复阅，归类，编次第，计算字数，造每编总目录等。”主编印顺法师要求严格，一再谆嘱：“每篇稿件，除了标点和更正错误外，用字行文，必须力存其旧。尤其是大师亲笔写的文章，不可随意增删；讲录稿，因为笔记者的文字巧拙不同，非有伤题旨及认定确属有欠通允处，不必多为删改。”一篇稿件至少须经过三至四次的校阅，稍有所疑，立即请示，然后决定。印顺法师将“全书”收集的每一篇文章，“都细心地保留其写作及登载的时间和期刊数，这样一个贴切的远见，使得在贯穿

太虚大师的整个思想历程上，可以完整无遗地连贯起来，同时也减少个人很多摸索的时间”<sup>[19]</sup>。

可知整个《太虚大师全书》从征稿到编辑都是严谨和认真的，其质量也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是却将《佛学的将来》给疏忽了，这不得不说是“全书”的一个遗憾。要想能够比较通畅地解释疏忽的原因，笔者认为，大概只能用资料不全和注意力不够来解释。“全书”的出版，太虚生前是知道的，印顺法师也曾经受太虚的委托，为太虚在《海潮音》《正信》上面发表的文章整理过目录，并提出过修改意见。

印顺法师住在武昌，奉太虚大师之命搜集太虚的著作，编出目录是在哪一年？现在的史料没有说明。我们只能根据一些记载来进行推测。民国二十三年（1934），太虚大师 46 岁，6 月 25 日抵汉口，驻锡佛教正信会。26 日，大师于正信会，“开示‘学佛之简明标准’，李慧空与周慧毓记”<sup>[20]</sup>。世苑图书馆在武汉建立，图书馆成立研究部，分编辑、考校二室，研究员有谈玄、尘空、苇舫、本光等人；其后陆续来者，有力定、守志、印顺等人。第二年，太虚一直在武汉和厦门等地游走讲学，此时“大师已病，返上海疗治，感衰老剧增（致法尊书八）”<sup>[21]</sup>。第二次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大师 58 岁，3 月 20 日，大师由重庆飞汉口，驻锡佛教正信会。受武汉缙素盛大之欢迎，于汉口正信会讲《维摩诘经》。

时世苑图书馆，日兵去而国军又来；院舍圯落。

众以不忍大师伤心，阻之未过江一行。<sup>[22]</sup>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底印顺法师到武昌，一直住到二十七年（1938）到四川。民国三十五年（1946）秋天，印顺法师从开封回到“武院”，十月在武昌佛学院世苑图书馆讲《从复兴佛教谈研究佛学》。<sup>[23]</sup>印顺法师编纂太虚大师的著作目录，应该就在这一时期，因为这时“全书”的工程已经开始启动，印顺法师被太虚大师推举为编勘委员之一，太虚大师见过印顺法师编纂的目录。“全书”的目录应该是在印顺法师编纂的目录基础上而形成的，美中不足的是太虚早期撰写的文章没有被收录进来，而这个“早期”应该是《海潮音》创刊前的这段时间。这时太虚不仅写了很多佛教的文章，也写了不少非佛教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是在佛教刊物刊出，有的则是在非佛教刊物上刊出，例如《〈肇论〉“四句偈”解》就刊登在非佛教刊物《叕社丛刊》1915 年第 2 期上，

而这篇文章也没有被收入到“全书”里面。

《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和《佛学的将来》出版了至少6版,足以说明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与影响力,及其受欢迎度,面对影响力这么大的作品,太虚很可能会觉得将原本学术性较强的题目改成比较通俗,更容易懂的题目可能会好一些。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也是传统文化影响不够的地方,所以此文要在香港出版,改成通俗易懂的题目也是势在必行的,所以《佛学的将来》之题目或许是太虚自愿提出的,或是香港佛教会的编辑,根据文中的内容而新定的,之后得到了太虚的肯定。此书出版时太虚大师正在广东和福建等地讲经,他应该是见过这本书,而且同意使用新书名,否则他不会向《佛教日报》记者提起。印顺等人在编纂“全书”时,依据的资料是《海潮音》,没有见到香港版与广州版的小册子,此时太虚大师也离开了人世,故而《佛学的将来》就不再被提起,这就让我们看到“全书”编纂时的一个小遗憾。笔者在这里只为太虚著作做一番小小考证,供同行们参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 注释:

- [1]《太虚大师全书·编纂说明》精第1册。  
[2]《人海灯》,2017年第2期。  
[3]太虚:《佛教日报发刊题辞》,原载《佛教日报》第

三号。后收入《太虚大师全书》之《第十九编“文丛”》。

[4][5][7]太虚大师讲,弟子芝峰记,法航校对:《佛学的将来》,香港佛学会印,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第1页,第2页。

[6]《佛学半月刊》,1935年第112期,第14-15页。

[8][9][10][11][12][13][14][20][21][22]《太虚大师年谱》。

[15]太虚云:“十月初,亦即如期出版。时樊老已将归源庵代为交卸,而大慈等赴金山受戒出堂。大觉、大勇暂留金山禅堂参学。大慈其时已宣布通过家族,妻儿等皆返宜昌家中去住,大慈仍由家中供给资用。以玉皇介绍接杭州西湖南山石屋洞相近之净梵院,筹备闭关,由玉皇管理院务。其第二子恭佐,即恒演,随侍护关。议定我亦去净梵院住,结束上海觉社。每季的丛刊,自庚申年改《海潮音》月刊。我于杭州编辑,每期编成,邮上海仍托中华书局印刷发行。十一月间,我遂收拾所有书物等,皆运杭州定住下来,在阿弥陀佛诞辰为大慈封了关。”《十五年来海潮音之总检阅》见海刊十六卷一期。

[16][17][18]续明:《编纂始末略纪》,《太虚大师全书编纂说明》,《太虚大师全书》。

[19]洪金莲:《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序》,台湾东初出版社,1995年版。

[23]《印顺导师略谱》。

(责任编辑:王丽心)

DOI:10.16805/j.cnki.11-1671/b.2019.0159

## 2019 全国佛教院校中观专业教师研修班在南京举行

本刊讯 2019年6月11日至15日,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江苏省佛教协会协办、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承办的全国佛教院校中观专业教师研修班在南京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心澄法师、宗性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宏度法师,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院长隆相法师,中国佛教协会教育培训部主任园慈法师等领导嘉宾出席了活动。

宗性副会长在开班式上指出,中观学的阐释,应始终坚持引领佛法修行,以无我利他的菩萨情怀,践行大乘菩萨道精神;中观学的弘传,要注重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区的中观学面貌整体加以对照和关联,要全方位认知中观学的传播;中观学的当

代弘传,也要注意现代科学对宇宙、生命、人生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要将中观学诠释与当代社会知识体系实现有机对接,启发大众从佛教中观学的角度,认知宇宙、了解生命、认识人生。

在为期五天培训时间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心澄法师、中国人民大学张风雷教授、东南大学董群教授、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向学法师等为来自全国32所佛教院校的60余名学员授课,围绕“中观学”的主题,详细辨析了印度“中观学”原典、祖师思想,深入解读了中国佛教古代高僧对“中观学”的接受、吸纳、中国化的历程。

(妙戒)